

## 1935年：45岁胡适在桂林坐飞机

70余年前，1948年8月12日，胡适在北平空军司令部讲演，题为《人生问题》。讲演开篇即提到美国莱特兄弟的飞机试验与自己的飞行体验，这样的“开场白”与当时的讲演场合是非常适宜的，这当然是与在座的空军听众的一番“互动”。胡适这样说道：

1903年，我只有12岁，那年12月17日，有美国的莱特兄弟作第一次飞机试验，用很简单的机器试验成功，因此美国定12月17日为飞行节。12月17日正是我的生日，我觉得我同飞行有前世因缘。我在前10多年，曾在广西飞行过12天，那时我作了一首《飞行小赞》，这算是关于飞行的最早的一首诗。诸位飞过大西洋，太平洋，我在民国30年，在美国也飞过4万英里，这表示我同诸位不算很隔阂。

应当说，胡适的确可能是近代学者中坐飞机次数最多，飞行时间最长，飞行里程最多的那一个。年轻时“暴得大名”的胡适，国内各地的学术、教育、文化活动多有参与，时有乘坐飞机往返于南北各地。而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胡适又受命出任驻美全权大使，曾飞赴欧美各地进行外交活动与讲演访学，乘坐飞机的机会与次数自然更多。1946年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，胡适亦经常乘坐飞机往返于南北各地公干；1949年之后，流寓美国，更是经常乘坐飞机往返于欧美与台湾之间。所以，胡适自谓“觉得同飞行有前世因缘”。

胡适讲演中提到的《飞行小赞》，即其1935年游览广西乘坐飞机时所作的一首诗。原来，1935年初，胡适应邀前往香港讲学并接受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，在香港会晤了李宗仁，受李之盛邀往游广西。自当年1月11日，胡适先后飞赴梧州、南宁、柳州、桂林等地，最终飞往广州，结束了广西之行。胡适在飞机上对桂林山水依旧恋恋难舍，颇有意犹未尽的思想之情。他“在空中又作了一首小诗，题为《飞行小赞》，诗云：

看尽柳州山，看遍桂林山水。  
天上何须半日，地上五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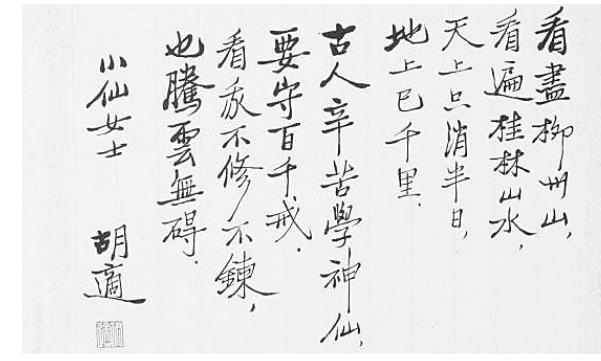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辛苦学神仙，妄想出三界。

看我凡胎俗骨，也飞行无碍。

胡适的广西之旅，通过其《南游杂忆》一书及《胡适日记全编》相关记载，不难摸索出游程大概。13年后，胡适在北平空军司令部讲演中提到的“飞行小赞”，即诞生于这一旅程之中。

# 谁先冲上云霄——康有为、徐志摩、胡适的飞行体验与记录

胡适小赠友人手迹（与原本略有差异）



## 1930年：40岁胡适与两位名儒在上海“试飞”



至上世纪50年代末，胡适结束流寓美国的生活，定居台湾从事学术研究工作。某日，曾对其秘书胡颂平偶然谈起一桩往事，乃是其40岁时与两位名儒“试飞”的事迹，后被胡颂平将谈话内容收入所编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第1册。书中所记述谈话内容如下：

是年（1930年），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不久，邀请几位名人在上海上空游览一周。那天请的3个人：一位是王人文，80岁了，前清的探花，曾经当过四川总督；另一位是

岑春煊，也80左右；第三位是先生。先生到了机场，看见飞机很小，只有3个座位，心里有点怕。后来看见岑春煊上去了，王人文是被抬上去的；他们两位老人也有胆量上去，先生也上去了。飞机在淞沪上空盘旋了一圈就下来了。这是先生第一次坐飞机。事后人家对先生说：“你错了！他们两位是到了年纪的人，已无所谓。你还年轻，犯不上冒险。”

至于胡适谈话中提及，与其同机“试飞”的两位名儒，一为王人文，二为岑春煊，二人皆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。二位名儒的年岁，皆为古稀之龄上下，都比胡适要长近30岁。这样的年岁，敢于尝试在中国尚属试验性质的新生事物，敢于“以身试飞”来体验乘坐飞机的人生首度经历，仍是颇令人叹服的。

在此情势之下，正值而立之年的壮年胡适，虽然看到“飞机很小，只有3个座位，心里有点怕”，可再看到“他们两位老人也有胆量上去”之际，也就欣然登机，与二位名儒同机“试飞”，实现个人生涯中的“首飞”了。

## 1931年：徐志摩参与试飞坠机身亡

胡适于1930年即实现“首飞”，且是乘坐舒适程度与安全系数皆不高的小型飞机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，不但勇气可嘉，也属时尚新潮之举。

须知，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航空事业，刚刚起步，机型、机载量与航班、航线都极其有限。对于普通公众而言，乘坐飞机不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出行方式，亦是颇有风险甚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冒险之举。

就在胡适“首飞”一年之后，1931年11月19日，胡适好友徐志摩，即因飞机失事而坠机身亡。中国新诗界杰出的代表就这样英年早逝，消息传出，社会各界无不感到震惊与哀痛。为此，胡适及徐氏生前朋友，要在北京举办一场特别的追悼会。

据考，徐氏乘坐的飞机，乃是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引进的史汀生SM-1F“底特律人”型单发6座上单翼飞机。1931年11月18日，徐志摩乘火车由上海抵达南京。

11月19日上午8时，中国航空公司史汀生SM-1F型512“济南号”飞机，起飞升空，由南京飞往北平。

飞机师王氏、副机师梁氏都是南苑航校毕业生，此次飞行主要是运载2000多封信件，乘客仅徐志摩一人。



徐志摩追悼会将在北大举行之报道，附录胡适致失事飞机所在航空公司电报。

1931年11月28日，北平《世界日报》刊发一篇新闻报道，乃是预告将在北大召开“徐志摩追悼会”及一组转发来自上海（11月24日）治丧处方面的相关信息。其中有一条胡适“昨晚覆电致航空公司”的信息，颇可见胡适本人始终对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抱以热忱，因之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也向来持乐观态度，并不以友人坠机身亡而将乘坐飞机出行的方式视为畏途，反而还要以此为契机再次表达个人对民用航空的支持。

飞行开始时天气甚佳，不料在济南附近党家庄一带忽遇大雾，飞行员为寻觅航线，降低飞行高度，不慎误触济南长清的开山山顶，机油外溢，机身起火，坠落于山脚。待警员寻得残骸时，两颗飞行员皆已烧成焦炭。徐志摩座位靠后，仅衣服着火，皮肤有一部分灼伤，但额头撞裂，为致命创伤。就在此次飞机失事之后不久，这条新开辟的从南京至北平的航线，迫于社会各界压力，不得不同年12月25日彻底停航。

## 1923年：66岁康有为保定“尝鲜”

时年66岁的“康圣人”——康有为，在1923年即作一首“飞行诗”，只不过此“飞行诗”，因其为从未发表的手稿，至今亦未辑入康氏各类文集、选集之中，少有人知罢了。原来，晚年康有为特立独行，不顾老迈之躯，坐上了当时国内少有且普遍认为安全系数堪忧的飞机。康有为还在飞行之后，即兴挥毫，写了一篇“飞行诗”，其诗原文如下：

飘乎乎，我今日又上青天。  
升腾虚空，凌跨紫烟，俛视人世，  
临睨山川。回旋霄汉而翔碧落，  
如羽化而登仙。松林为芥苗，人  
马为蚁迹，峻岭为丘墟，长河为虫  
蜿蜒。下视保定十里之大城，如  
一方器之在蜃层中。崇楼杰阁为  
覆杯，市廛境亩为井田。乘云乍抑扬，  
御风更上迁。忽逍遙乎，月宫乃巡历乎。  
木土火金水之星，法登太阳日天子之殿；  
周太渊紫渊天市之垣，入北极之辰而四眺，  
乃叔晃昱而穷游，太元之元回盼  
吾地之渺小，曾不逮巢蚁。睫蟠  
之末孙，乃为争祸角之微末，日  
弄蛮触之兵铤，自称王霸，而高视  
正于南柯蚁关之梦焉。吾化形人  
之徒与，而谁与，哀生民而救旃。  
不愿居天上，仍还处人间。忽飘  
堕于吾地，遂转轮于尘寰。尽諸  
天游戏事，世界无量劫经贤。

至于胡适谈话中提及，与其同机“试飞”的两位名儒，一为王人文，二为岑春煊，二人皆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。二位名儒的年岁，皆为古稀之龄上下，都比胡适要长近30岁。这样的年岁，敢于尝试在中国尚属试验性质的新生事物，敢于“以身试飞”来体验乘坐飞机的人生首度经历，仍是颇令人叹服的。

在此情势之下，正值而立之年的壮年胡适，虽然看到“飞机很小，只有3个座位，心里有点怕”，可再看到“他们两位老人也有胆量上去”之际，也就欣然登机，与二位名儒同机“试飞”，实现个人生涯中的“首飞”了。

（局部），原载于《北洋画报》



癸亥三月二十五日，莅保定乘飞机，其中御风神为天游口占。

南海康有为天游化人题

这一幅康有为自撰并亲题的“飞行诗”手迹，影印连载于《北洋画报》第319、320期之上，时为1929年5月。当时，康有为已逝世两年之久，这幅手迹为收藏者徐善伯交由画报刊发。

徐善伯，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徐勤之子，曾抄录整理过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。据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，有康于1923年“三月谒泰陵、昌陵，至保定乘飞机”的记载。可知，“飞行诗”实作于此年。

据康有为落款“癸亥三月二十五日，莅保定乘飞机”云云，可确定1923年5月10日，康在河北保定乘飞机。那么，飞往何处呢？据年谱可知，康在谒西陵之后，“游河南开封禹王台龙陵”；也即是说，康在河北保定乘坐飞机，极可能是飞往河南开封的。

事实上，康有为从保定至开封，乘坐的只可能是私人飞机，或者是搭乘当地政务及军用飞机。据考，中国民用航空最早只是于1920年有过短暂开通，且航线单一，只有从北京到天津的航线，至1924年就停办了。所以，康有为于1923年即坐飞机从保定飞赴开封之举，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。

至此，近现代名士坐飞机谁最早，坐飞机写飞行诗又属谁最早，或者说谁写的飞行诗“算是关于飞行的最早一首诗”，答案终于揭晓。早年维新变法、晚年尊孔复辟的“康圣人”，竟然胜过了被时人视作新文学、新文化运动领袖的“胡圣人”。真可谓：“老革命”领跑“新青年”。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## 于谦“两袖清风”美名传

于谦是我国明朝著名的清官，他为官清廉、忧国忧民，在国家危亡时勇于挺身而出，保卫了国家，人称“救时宰相”。

于谦严以律己，为官不搞排场，生活节俭。他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、山西都御史，上任时，乘坐的是普通的骡马车，既无锣鼓仪仗，也无卫兵随从。他下去暗访时，也都是轻车简从，从不惊扰百姓。在生活上，他衣不华美，食不兼味。别人过生日大搞庆典，大收贺礼，而于谦过生日，谢绝一切贺客，拒收所有贺礼。

于谦对当时官场上的腐败现象

深恶痛绝，当时，太监王振把持朝政，贪污盛行，贿赂成风，大臣进京，必须送重礼，但于谦却一身正气，坚决抵制，不随波逐流。他进京时，有人劝他也带些礼物去，哪怕是土特产。他则举起双手笑道：“我带有两袖清风。”并作《入京诗》一首：“绢帕蘑菇与线香，本是民家用反殃；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这便是“两袖清风”典故的由来，也是于谦反腐倡廉决心的生动表现。

1449年，蒙古瓦剌部入侵，在土木堡战役中，明军大败，明英宗被俘，消息传到北京，朝廷震惊。当时有人主张放弃北京南迁，于谦则为主抗

刺，保卫北京。在此紧急关头，他临危受命，督战指挥22万军队，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，使国家转危为安。后明英宗也被瓦刺放了回来。1457年，明英宗复辟，于谦这位为保卫国家作出贡献的朝廷栋梁和英雄，却被昏君和奸臣罗织罪名处死。

于谦被杀，奉命去抄家的官兵发现于谦家中空空无物，只有皇帝赐给他的蟒衣、剑器存放在上锁的正屋中，而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动用过。

于谦遇害的时候，阴云密布，大家都知道他是被冤杀的。都督同知陈傅被于谦的忠义感动，冒着风险收敛了他的尸体。后于谦女婿又将灵

柩运回故乡杭州，葬在西湖边。

明宪宗时，于谦得以平反，明孝宗时，在杭州的于谦墓旁建“旌功祠”。1751年，乾隆南巡时，题写了“丹心抗节”的匾额。林则徐非常敬重于谦，重修了于谦的墓祠，并写下了“百世一人”的大字，悬挂在墓祠之上。

于谦早年曾作过一首歌颂石灰风格的《石灰吟》：“千锤万击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这首诗真实地表现了于谦忠烈清白的一生。《明史》称赞他“忠心义烈，与日月争光”。（据《天津日报》）

## 吕正操：创立地道战地雷战

在中国，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地道战、地雷战等令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抗日故事。这些经典的游击战术，正是来源于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，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就是吕正操。

1941年至1943年，为了粉碎敌人的“蚕食”进攻和大“扫荡”，吕正操带领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，在无险可据的平原上和极端残酷的环境中，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和无穷无尽

的智慧，灵活运用地雷战、地道战、蘑菇战、顶牛战等新战法，使敌人吃尽苦头，时时处于惶恐之中。这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，很快就在各抗日根据地扩展开来，有效地打击了日军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些战术最大程度地发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，真正起到了全民皆兵的效果，使敌后抗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。

（据《天津日报》）

## 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

1939年5月初，新四军第一支队六团，奉陈毅之命，从茅山出发，途中与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（简称“江抗”）合编，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，部队得到很大发展。部队在取得黄土塘、浒墅关战斗胜利后继续东进，其一部直逼上海近郊。

7月23日，日伪军数百人前来“扫荡”，遭到“江抗”伏击，这股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，掉头向上海方向逃窜。“江抗”第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率五连、六连和两个机枪排，一路追击敌人，廖政国率领侦察班冲在最前面。当晚，在上海中共党组织派来做部队向导的地下党员带领下，廖政国等人一气连续追击60余里，直追到了一个“样子很奇怪的地方”方才停下。廖政国见前面围墙和铁丝网密布，中间有一大片空旷的场地，四周坐落着不少“没见过的洋房”，便向导问向导这是什么地方。

听向导回答说这里是虹桥机场，廖政国的眼睛顿时一亮。他早就听说，虹桥机场被日军占领后，成为华东日军高级将领、各路军政要从日本飞抵中国的“第一站”。既然误打误撞到了虹桥机场，廖政国当即决定集结部队进攻，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

趁着夜色，廖政国率部悄悄地向虹桥机场包抄过去。敌人丝毫没有察觉到这支新四军部队的存在。几个战士轻而易举地就破坏了铁丝网，两个连队摸到了一排房子前，挨

第二天，上海租界出版的重要报纸上，均用特大字体刊载了《新四军万余人夜袭虹桥机场》的消息。

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## 毛泽东：饮食十分节俭

毛泽东作为农民的儿子，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。他平时穿戴朴素，衣服补了又补。他在“吃”上同样十分节俭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卫士武象廷改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没几天，一次毛泽东来到厨房，看到他正在忙碌，就问他：“武象廷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武象廷说：“我刚买菜回来。”毛泽东说：“你改行了。好啊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们饭菜做得干净卫生就可以了，不要买贵重的东西给我吃。比方说，现在是冬天，你就别买那些西红柿、黄瓜之类的新鲜蔬菜。现在买一根黄瓜的钱，到了夏

天就能买一筐黄瓜，冬天买一根黄瓜只能吃一顿，夏天买一筐黄瓜能吃十顿。”

毛泽东每个月都要检查家庭的收支账。到外地视察，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也不忘自己伙食费开支。一次到庐山开会，毛泽东找来秘书高智，对高智交代道：“高智，你与李师傅核算一下，看看我伙食费超了没有，超了不能补贴。”李师傅认真核算了一遍，汇报道：“没有超过。”毛泽东又问道：“煤钱算进去没有？”答：“算进去了。”毛泽东又叮嘱道：“超过了不能叫当地补贴。”

（据《天津日报》）

## 唐绍仪当县长

唐绍仪1862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（今中山县），祖辈务农，晚清年间与詹天佑等多名幼童被公派赴美留学，回国数年后偶遇袁世凯，不久当上袁的智囊成员。

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窃得民国极位，唐绍仪得以重用，袁继任临时大总统，唐出任民国内阁首任总理。但在执政中唐发现袁世凯独裁意识相当严重，致使既定的“责任内阁制”无法推行；尤其在用人、财政以及遵守与执行《临时约法》等诸多方面，分歧越来越大，裂痕愈来愈深。唐绍仪不仅深感自己这个总理实在不好干；而且与袁多年的交情也因此而岌岌可危。想来想去决定金盆洗手，于是上任不到3个月便愤然辞职回到老家。

赋闲19载，年近古稀的唐绍仪出任中山县县长，在这个七品芝麻官的位置上，他比当年做奉天（今沈阳）巡抚、邮传部尚书、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、民国总理干得愈发起劲，发誓要将中山县建成全国模范县。

他为政清廉，勇于革除官场衙门陈规陋习；他四处化缘，修马路，建医院，把自家花园改成公园对市民开放。马路修好了，下水道井盖常被偷走当废铁卖，还发生过行人车马于夜陷入人盖窨井的事。

唐绍仪获知，即刻下令紧急铸造并换上新井盖，其上铸有“本县令：盗卖与盗买，